

抗戰晚期的民變與地方社會

——以平陽的大刀會與同善社為討論中心

羅 士 傑*

摘 要

本文討論1943至1950年浙江省溫州平陽縣由當地同善社恩職人員董仁漲、朱超高結合蔡月祥之大刀會所發動的民變，除了傳統成王敗寇與秘密社會發動匪亂暴動的解釋外，本文結合官方檔案與民間文獻去回答下述問題：參與民變的人群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他們又是藉由怎樣的政治社會文化權力網絡關係去進行結合？本文從地方社會發展與民間邏輯出發，以該事件為切入點，選擇以抗戰晚期的平陽縣的同善社與大刀會組織的發展歷程為討論中心，去進一步釐清在東南沿海地區，不同時代不同人群是如何組織起來去解決他們所面臨的生計問題？有別於過去將大刀會與同善社視為「會道門組織」的研究取向，本文將特別著重他們作為一個大眾組織在抗戰晚期的平陽縣發揮組織人群的政治功能的討論。本文預計展開的討論脈絡如下：首先將澄清二十世紀以來同善社以及大刀會組織在平陽的發展狀況；再討論強調宣揚儒家思想的同善社何以會與大刀會結合並發動民變；最後反思廿世紀以來地方社會人群對現代國家推動政權建設所造成的壓力的應對之道。

關鍵詞：同善社、大刀會、救世團體、大眾組織、中國地方政治

2017年6月23日收稿，2017年10月23日修訂完成，2018年4月25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一、前 言

1949年5月7日到5月13日，中共在浙江省溫州市各地縣城陸續成立新政權，平陽末代縣長羅傑則於5月10日逃離平陽。¹閩浙兩省交界的平陽縣中共政權成立不久後，即面臨當地大刀會的強力挑戰。據6月14日靈溪（今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當時隸屬平陽縣）共產黨地方幹部的報告指出，當地的大刀會組織揚言：「靈溪是大刀會跟農民解放的，應由他們（大刀會）坐天下，如今共產黨來坐天下，是薛仁貴打戰，張士貴得功，他們心不願，決心要奪回靈溪糧倉幾十萬斤糧食，使得解放軍無糧可吃。看來，他們最近就要暴動。」自6月19日開始，據報大刀會眾開始「吃符練法」，準備攻打靈溪縣城。²隔日，幾路的大刀會眾發起圍攻靈溪縣城，這一場戰役解放軍方面有描述如下：

1949年6月20日上午，2000多名大刀會分五路從浦亭尖家坳及橋墩等方向來攻打我平南區委所在地靈溪。……唯因顧念大刀會眾絕大多數都是受騙的群眾，不忍馬上開火。……由於我們部隊的一顆子彈，往往擊斃三、五個甚至於六、七個大刀會眾，再加上他們毫無軍事知識，當我們手榴彈擲到他們面前正在打轉時還前來圍觀，最後被手榴彈炸死。³

解放軍報告雖有誇大，但自稱吃符練法後刀槍不入的大刀會眾，就算在人數占上風，仍不敵解放軍的槍彈。這一場幾乎是「兩個文明」之間的靈溪保衛戰，雙方傷亡數字十分懸殊。據報大刀會眾有96至200人陣亡，解放軍則僅有4名陣亡。戰役結束後，平南區共有五千餘名大刀會眾向新政權辦理自新手續，收繳數百把刀矛與「堆起一厝間的法衣」，展現

1 見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浙江省溫州歷史大事記：1949年5月-1994年12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1-2。

2 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蒼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第7輯（大刀會始末）（溫州：編者印行，1992；以下簡稱大刀會始末），頁70-71。當時直屬浙南特委指揮的兵力為1008人。見鄭海嘯口述，葉啟友主編，《鄭海嘯回憶錄》（平陽：中共平陽縣委黨史研究室，1991），頁89-90。

3 周干、王志斌，〈平陽大刀會始末〉，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第10輯（溫州：編者印行，1992），頁101。

的實力令人印象深刻。⁴ 從解放軍觀點來看，這一群浙南大刀會「捧香爐的、扛大旗」的「法兵」根本不堪一擊。如下文要指出的，1949年六月平陽大刀會圍攻靈溪並非孤立事件，而是1943年以來至1950年中共新政權建立，發生在東南沿海的閩東與浙南地區重要「民變」的延續。因此，大刀會眾抗爭的對象是跨越國共兩黨政治鴻溝，甚至還牽扯到當時日本在閩浙兩省以及沿海島嶼所扶植的占據勢力。更重要的是，此地方民眾透過宗教結合起來的大眾團體與政權的對峙，除了跨越國共的界線，同時也跨越不同時代，甚至不同國家的統治區域。⁵

若說每一場民變都傳達出當地百姓要給執政者的訊息，那自抗戰晚期至中共新政權建立這一系列爆發的民變，又傳達出哪些於地方社會發展的訊息？除了傳統成王敗寇與秘密社會發動匪亂暴動的解釋，學者必須進一步追問：這些挑戰新政權的人群是如何被組織起來？又是藉由怎樣的政治、社會權力文化網絡結合？本文從地方社會發展與民間邏輯出發，以抗戰晚期平陽縣同善社與大刀會組織的發展歷程為討論中心。以該系列民變為切入點，釐清東南沿海地區，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如何組織以解決他們面臨的不同生計問題？有別於過去將大刀會⁶ 與同善社⁷ 視為

4 《大刀會始末》，頁76。

5 據三谷孝、孫江的研究，類似的事件還有1943年河北永清縣的紅槍會對抗日本佔領軍、1945年2月，同為日人佔領區的江蘇無錫爆發的先天道徒與偽軍衝突。中共各根據地的游擊勢力亦多與地方宗教組織發生衝突。見三谷孝著，李恩民等譯，《秘密結社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孫江，《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臺北：博揚文化出版公司，2016）。

6 關於十九世紀末以來浙江民間組織的研究，可見陶成章，《浙案紀略》，收入湯志鈞編，《陶成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23-428。關於晚清至民國時期各地之結社的研究可見（日）末光高義，《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大連：滿州評論社，1932）。申仲銘編著，《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民國會門武裝》（北京：中華書局，1984）。周建超，《秘密社會與中國民主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7 目前關於同善社的歷史，見陸仲偉，《中國秘密社會：第五卷·民國會道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邵雍，《中國會道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王見川，〈同善社早期歷史（1912-1945）初探〉，收入王見川主編，《民間宗教·民國時期的教門專輯》第1輯（臺北：南天書局，1995），頁57-82。王見川，〈同善社早期的特點及在雲南的發展：兼談其與「鸞壇」、「儒教」的關係〉，

所謂「秘密社會」的研究取向，本文視其為民間結社（association）於抗戰晚期在平陽地方社會發揮組織人群的政治功能。本文首先將釐清二十世紀以來同善社以及大刀會組織在平陽的發展狀況；其次，論證強調宣揚儒家思想的救世團體同善社結合大刀會組織並發動民變，其實與平陽縣長張韶舞以及第八行政區督察專員張寶琛所推動的強硬徵兵、徵糧政策有關。第三，釐清董仁漲、朱超高與蔡月祥三人分別組成的大刀會武裝與國民黨地方政權對峙的過程。最後，本文將反思並重新檢視，二十世紀以來地方社會人群面對現代國家的應對之道。

二、同善社、大刀會與二十世紀以來的平陽地方社會

平陽縣位於浙江省溫州市東南方，臨接福建省福鼎市，當地百姓多從事農、漁業。1940年，本縣分為城區、鰲江區、水頭區、靈溪區、宜山區與馬站區，人口約七十一萬人。⁸ 1949年前的平陽縣為浙江省第二大縣，1981年分為平陽與蒼南二縣。抗戰時期平陽縣治設在宜山鎮，靈溪鎮則是今日蒼南縣縣治。該縣雖然兩度被日軍短暫攻占，基本上仍屬於非淪陷區。本文討論的大刀會與同善社的組織影響範圍，則位於鄰近海岸線的宜山、馬站與靈溪三區。

回到廿世紀以來平陽地方歷史脈絡進行討論，此一延續七年（1943-1950），跨越兩個政權的大刀會民變的三位主要領導人：董仁漲（1915-1950）、朱超高（1922-?）、蔡月祥（1918-1948）當時都是年約三十歲的青壯年。他們發動民變對抗政府，主要與1939年至1946年平陽縣長張韶舞（?-1951）的強力徵兵政策有直接關係。⁹ 根據鄧倫修等地方

《民俗曲藝》172(2011.6): 127-159。最近日本青年學者小武海櫻子的研究也值得注意，見（日）小武海櫻子，〈同善社與慈善事業：以合川會善堂慈善會為例〉，收入《民間儒教與救世團體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09），頁365-384。

8 見平陽縣志編纂委員會，《平陽縣志》（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3），頁6-24、130。

9 張韶舞，字力行，安徽巢縣人，曾留學日本，是民國以來平陽任職時間最長的縣長。張韶舞與當時浙江第八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張寶琛在平陽地區的施政多有爭

文史工作者的研究，董仁漲出身錢庫（今蒼南縣錢庫鎮），家中因經營山產經銷致富，自小習武學醫而享有盛名。董氏於 23 歲（1938）時參加曹聖甫的同善社，並求得同善社的恩職（同善社組織的傳教職位）。至於朱超高則出身橋墩（今蒼南縣橋墩鎮），家中亦是經商為業。1939 年，朱氏 17 歲時參與范佩玉的同善社組織，19 歲時赴上海取得恩職。（蔡月祥的介紹詳於後）根據學者研究，同善社淵源於清中葉的先天道，1912 年成立，1917 年向北洋政府呈文取得合法地位。¹⁰ 同善社的骨幹成員以軍閥政客、地主士紳商人、知識分子為三多，此亦使同善社發展為民國以來救世團體（redemptive society）中的翹楚。¹¹

據同善社師尊彭泰榮（1873-1950）指出，1923 年前後為同善社發展的高峰，該救世組織分別在華東、華北、華南、東北等地設立 37 個省級分支，甚至發展到香港、新加坡等海外地區，全國道徒號稱三百萬人之譜。1926 年後被國民政府通令查禁成為非法組織，該社在合法時期就得到許多政要支持，因此仍保有生機。除了政要給予庇護，同善社以其教義內容宣揚傳統儒家學說，對過度西化保有戒心的各階層人群饒富吸

議。張韶舞因為執行國民政府徵兵、徵糧成績頗著，因此多次得到浙江省政府嘉獎。他於 1946 年離任時，另編有《平陽六年》，對他六年來施政多有描述，該書藏於溫州市檔案館。張韶舞相關紀錄見王光銘、孔慶杭，〈黃梅時節家家苦，青草池塘處處冤：記張韶舞治平罪行〉，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平陽：編者印行，1985），頁 65-74。游壽澄，〈緝拿張韶舞歸案記〉，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頁 45-48。平陽縣志編纂委員會，《平陽縣誌》，頁 871-872。

10 見王見川，〈同善社早期歷史（1912-1945）初探〉，收入王見川主編，《民間宗教·民國時期的教門專輯》第 1 輯，頁 57-82。

11 見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2003), pp. 103-122, 139-140, 154-162; Thomas David DuBois,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107-120;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p. 90-108; David Ownby, "Redemptive Socie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Vincent Goossaert, Jan Kiely, and John Lagerwey, eds.,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1915* (Leiden: Brill, 2016), volume 2, pp. 685-750. 另又可見王見川、康豹、宗樹人，〈導言：救世團體研究的回顧〉，《民俗曲藝》172(2011.6): 13-20。

引力。¹² 細讀同善總社發出的傳單與通啓，也可發現同善社的教義以維護傳統儒家文化爲主，並設有「國學專修館」宣揚五倫八德的道德規範。¹³ 另一方面，他們組織的主要宗教活動，多以結合佛、道以及民間信仰中因果報應觀念的解冤超薦儀式（如呈城隍疏文以求消罪）與進行地方慈善活動祈求功德積累爲主。¹⁴ 兼具兩個面向的同善社對當下的中國社會有相當強大的滲透力，但也因組織膨脹過快，在被國民政府下令取締前，各地分社就出現人事傾軋與財務收支不透明而遭到外界質疑等問題。

就教育程度而言，董仁漲爲錢庫小學畢業，朱超高則爲溫州聯中輟學；在接受新式教育之前，兩人都曾受過數年的私塾教育，對舊學應有一定基礎。¹⁵ 雖說同善社被國民政府所禁止，但在溫州以及東海沿海地區仍保持發展活力，董、朱也都擔任同善社的恩職。關於同善社恩職的制度，根據北京同善總社己未年十二月初八（1920 年 1 月 28 日）所發布的傳單第十一號，對稱謂或說基層組織的原則，有以下的規定：

- 一、稱謂之更定：初二、三層稱眾生，天證引保稱弟子，頂航以上稱男女兒。
 - 二、求職之程序：以後三層眾生領恩，先由引恩、或保恩，用福善禍淫四字稟闕。拈得福字或善字，方許薦與頂航。
 - 三、薦職之限制：以後天證二職，不能薦恩，如有冒干，降職一級。
- 以上規則，男女一律。¹⁶

根據學者的研究，被查禁前的同善社組織階序爲：北京總社、統號、省

12 陸仲偉，《中國秘密社會：第五卷·民國會道門》，頁 64-65。關於同善社對道德實踐的詳細討論，可見范純武，〈八德：近代中國救世團體的道德類目與實踐〉，收入康豹、高萬桑編，《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 225-259。

13 國學專修館設立規則，可見壬戌年傳單第四號，發於壬戌年九月初十，民國 11 年 10 月 29 日，收入《同善總社傳單彙編，丁巳至癸亥，附通啟》，未刊本。

14 關於同善社中城隍疏文的內容格式規定，見己未年傳單第二號，發於己未年二月十三，民國 8 年 3 月 14 日，收入《同善總社傳單彙編，丁巳至癸亥，附通啟》。

15 《大刀會始末》，頁 1-2、19。

16 見北京同善總社己未年十二月初八傳單第十一號，收入《同善總社傳單彙編，丁巳至癸亥，附通啟》。

號、縣號（被查禁後改稱先覺祠）、鄉鎮事務所。至於內部的人事道級則共分十六層，前三層為眾生（即一般信徒）、四層天恩、五層證恩、六層引恩、七層保恩、八層頂航、九層十地、十層五行、十一層四相、十二層三才、十三層兩儀、十四層皇極、十五層太極、十六層無極。第四層恩職即可被授權開示眾生，並開設家庭佛堂或壇，便利信徒修煉。五層的證恩則審查提昇四層天恩的三層眾生是否合格，而且可擔任鄉鎮同善設事務所、善堂的善長，八層的頂航與九層十地都已經是省級幹部，一省僅有幾位，十層以上則直屬北京總社。¹⁷可見第四層的天恩與第五層的證恩是同善社組織最基層的神職人員，同善總社對「恩職」所承擔的工作內容有詳細說明如下：

且地點既定，定期演講，或三聖經，或其他因果格言，……，首重倫常，次講慈善，即道外人亦可入場旁聽，以動其為善之心，苟有喜色，自易回頭，捨財濟人，漸成習慣，……恩職如此，可以為眾生榜樣矣。¹⁸

可見恩職主要工作就是定期到聚會所進行宣講，吸收信徒並推展地方慈善活動。浙江同善社約成立於 1922 年，省堂設在杭州，負責人是華安人壽保險公司的張姓職員以及查姓律師，浙江省長張載陽（1874-1945）還擔任名譽社長。1924 年至 1925 年溫州地區的同善社首事為陳瑞伍（?-1940）。¹⁹至於平陽縣同善社的具體成立時間不詳，但 1927 年平陽縣農民協會成立後，平陽同善社堂就為農民協會所進駐，社堂還因此遷往曹慶甫家。²⁰董、朱兩人所領取的都是最基層的四層天恩，因此都有出外傳教與設立新據點的任務。董氏在錢庫家中樓上設立佛堂，提供社區信眾誦經念佛與禮拜以及靜坐修煉之用。朱超高領取恩職時，雖然年紀較輕，之後他回到橋墩鎮老家建立社堂。此類鄉鎮社堂的運作經費，主要來自

17 陸仲偉，《中國秘密社會：第五卷·民國會道門》，頁 66-70。

18 見庚申年傳單第二號，發於庚申年五月初十，民國 10 年 6 月 25 日，收入《同善總社傳單彙編，丁巳至癸亥，附通啟》，未刊本。

19 陳瑞伍為溫州地區同善社的主要領導人，也是晚清平陽重要鄉紳劉紹寬的點傳師。劉氏民國 29 年的日記中記有陳氏的死訊，見劉紹寬著，《厚莊日記》，民國 29 年 10 月 2 日記（1940 年）。

20 見陶大恭輯，〈同善社〉，收入《大刀會始末》，附錄（一），頁 8。

信徒所繳交的入道費以及平時的特別捐募（又稱發心）。結合董仁漲等人的狀況，他除了以天恩的身分提供宣教服務並收取入道費，開設的佛堂也因提供醫療服務，並教授防身拳法，因此成爲地方上的人氣組織。²¹

董、朱建立的社堂，是同善社鄉鎮事務所的基層組織。一般來說，社堂會供奉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三畫像，四壁貼有宣揚三教的標語。加入同善社的方法非常簡易，入道者必須有兩位成員介紹，之後被引導至社堂叩求入道並行拈鬮（寫有「空」與「准」的紙團），拈得准字，即允許入道成爲道友，若拈得空字，則下次再拈，直到拈得准字方休。獲准入道後，由恩職主持「授訣」儀式，信徒在神前朗讀誓詞。關於前四層的修道過程如下：

修道逐層進行，初入道者稱初層，教他修養先天之性，即靜坐法……。
修性有得，即升二層，教其養命之法，修道有得，即升三層，教他滿身
周天養情之法，此法有得，即升四層，教授周天十二地支法。²²

同善社自廿世紀初以來在平陽地區所吸引的信徒，多半是擁有一定素養的鄉間文人與地方軍政人士。以目前所見的資料而言，溫州地區最重要的信眾，是自晚清以來多次擔任地方教育部門要職的鄉紳劉紹寬（1867-1942）。²³ 根據劉氏的日記，他早在 1911 年就與溫州同善社首事陳瑞

21 值得注意的是，1944 年國民政府的隨軍記者亦有董仁漲的組織「假借拳術組織、廣收徒子徒孫。以同善社組織假行仁義，替人醫病」的說法。見《大刀會始末》，〈蕩平平陽大刀會匪〉，收入附錄（一），頁 17。

22 見陶大恭輯，〈同善社〉，收入《大刀會始末》，附錄（一），頁 11。

23 劉紹寬，字次饒，號厚莊，出身於平陽縣江南鄉白沙里（今屬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曾受業於晚清溫州最重要的文人孫詒讓（1848-1908）。光緒二十四年（1898）擔任平陽龍湖學院的山長，光緒三十一年擔任溫州府學堂監督，並曾東渡日本考察日本的教育制度。中華民國建立後，1912 至 1918 年劉氏歷任平陽縣教育會會長、縣教育科長、永嘉與樂清縣教育科長、以及浙江省立第十中學校長。1918 年因為十中爆發學潮而辭職回鄉。回鄉後劉致力於編纂平陽縣志，至 1925 年方才成書，之後長期擔任溫州籀園圖書館館長。陳鎮波編，〈劉厚莊年譜〉，收入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第 16 輯《蒼南文史資料》（劉紹寬專輯）（溫州：編者印行，2001），頁 372-486。

伍共同研究靜坐之法，²⁴ 同善社於 1917 年取得合法地位後，劉紹寬於 1921 年 5 月正式加入同善社。²⁵ 一直到 1942 年去世之前，他經常在日記中分享他關於修煉靜坐的心得。對於劉加入同善社後求道的靜坐心得，姑引一例如下：

霽。晨起靜坐，專用回光法，兩目不離祖竅，兩耳聽息漸微，呼吸純是真息，愈微愈深，忽若虛懸無著。……至同善社拈香，謁拜太保廟。²⁶

除了在同善社靜坐養性修煉外，劉紹寬也與傳授恩職給董仁漲的曹慶甫（日記中做曹敬夫）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日記中除了經常提到劉與曹討論修佛靜坐，也旁及與曹的家人乃至於兩人與平陽軍政文化界人士的交往狀況。值得點出的是，即使在地方聲望崇隆者如劉紹寬也未必能修煉到第四層的恩職，反倒是相對年輕的董仁漲與朱超高可以修得恩職。無論如何，能有鄉紳劉紹寬加入所起的號召作用，同善社在平陽地區一般民眾間所享有高聲望與影響力則自不待言。

關於同善社成員何以日後出現武裝化的現象，陸仲偉認為同善社自始設有武裝組織，即安徽、江西一帶流傳的「柴門」。柴門的建立根據同善社內部的說法，安徽台石有一柴姓樵夫，一日山中砍柴，酣睡時夢見菩薩教他一套法術。他醒來後發現渾身是勁，刀槍不入，因此便創立柴門。柴死後由其弟子陳正武主持，後遇到安徽同善社號首黃巽垣，陳於 1943 年選擇歸附同善社，並因此成為同善社的武裝組織，江西等地同善社四層以上的幹部大都參加柴門。²⁷ 武裝化的發展趨勢以及同善社與大

24 見劉紹寬著，《厚莊日記》，宣統三年六月初一記（1911 年 6 月 26 日）。劉中年以後開始對佛學產生研究興趣，常與陳瑞伍研究靜坐之法。《厚莊日記》全文藏於溫州市圖書館地方古籍部。可見陳瑞贊，〈溫州市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敘錄〉，《文獻》2008.4(2008.10): 155。日記起自光緒十四年（1875），迄至民國三十一年（即劉氏逝世之年），日記的一部分曾刊於蒼南文史資料，見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蒼南縣文史資料》第 16 輯（溫州：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者印行，2001）。該日記之全文已併入《溫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稿抄本叢刊》第 5-1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

25 見劉紹寬著，《厚莊日記》，民國 10 年 5 月 1 日記。

26 見劉紹寬著，《厚莊日記》，民國 15 年 2 月 13 日記。

27 陸仲偉，《中國秘密社會：第五卷·民國會道門》，頁 71。

刀會的結合，則顯然是因為地方人群面對來自地方生活條件以及生活處境變化挑戰所產生的需要，平陽地區大刀會與同善社合作的關係模式，如陶大恭指出：

一是軍旅型，即由某一道門為首（一般為同善社首事）召集會徒（號稱法兵），佔據一方海島為寇，……與政府對抗；一是地方型，即由一村一地或數村設一法壇，延請法師（會眾稱為師父）傳授法術。²⁸

擁有同善社恩職的董仁漲與朱超高依其之後的發展，可以歸為第一類。至於第二類，可見另一位大刀會運動領袖蔡月祥（1918-1948）的生涯發展歷程。蔡月祥（蔡月常）生於平陽內塘龍青岩（今平陽縣鳳臥鎮內塘村），上過短暫私塾，後習得圓木手藝維生。1941年前後，蔡前往瑞安縣飛雲江口的北龍島謀生，結識島上教授大刀會法術的瑞安人陳雲鎖，學習刀槍不入的符法咒語。1943年間，南麂島同善社眾前來北龍島請「法師」教授刀槍不入法術，蔡月祥因為是陳的徒弟中學得最好最快，遂應邀前往授徒，並因此成為南麂島上同善社所組成之大刀會的祖師爺。²⁹

大刀會的法壇通常設在村落的廟宇或祠堂，主祀神明則各地有些許差別，但大多來自《封神榜》、《三國演義》與《西遊記》內的角色人物或地方神祇。每一法壇都設有首事、法師與符師。要加入大刀會，也必須有兩位會徒介紹，並經過首事同意。入會儀式之前，會眾要先齋戒沐浴三天以證明心誠。大刀會的入會儀式各門派繁簡不一，傳授的符籙咒語也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有祭拜神靈、發願與噴身等三個階段。

噴身其實就是一種淨化儀式，完成該儀式後，方才完成入會。之後入會者便進入「練功」的階段，練功的時間一般都安排在晚上。會徒沐浴淨身後，會跪在神壇前吞符進行跪香，期間由法師傳授法語，能通背的法條越多，跪香的時間就越久，功力也就會越深。這樣的過程一般會持續七七四十九天，之後便安排進行「試刀」（大刀會的法術訓練，本

28 陶大恭輯，〈大刀會組織及其淵源：大刀會〉，收入《大刀會始末》，附錄（一），頁1。

29 關於蔡月祥的背景，一說蔡氏出身龍青岩為中共浙南革命老區，因此蔡氏於1939年加入中共，不過此說並未被中共組織部門證實。見《大刀會始末》，頁34。

有排磚、排刀、排槍、排砲等不同名目，但到最後只簡化剩下試刀）。試刀儀式的過程如下：

試刀時，會徒袒露上身……。法師持刀拍打桌子一下，叫聲上法，會徒即平馬坐禱站定……。法師口念咒語，吸法氣，向刀鋒吹過，即挨次向會徒腹部猛砍三刀。³⁰

試刀的過程中，多數人的肚皮上只會留下刀痕。試刀用的是大砍刀真砍，但關鍵還是法師執刀人的技巧，貌似千鈞，實則縙銖，挨到輒止。只能直砍，不可抽拉，這樣剛好可以配合肚皮的彈性。完成訓練的大刀會徒會繼續修煉，日後還會升格為法師擔任衝鋒的任務。³¹ 雖說試刀非常接近十九世紀末流行於北方的大刀會中的「金鐘罩」硬氣功。³² 但大刀會眾透過試刀的「儀式展演」所發揮的精神動員能量卻是非常地驚人。另一方面，試刀儀式也是大刀會內部的「升遷管道」，可以甄選出組織中的領導人物。大刀會會眾的組織階序，基本上可見於他們的行軍序列：

……這路大刀會武裝約三、四百人，排成兩路縱隊，……為首那人，頭扎紅布，身穿白短褂，配紅帶，胸綴黃符，臂戴紅袖章，一只香爐用紅布吊在胸前，……後面一人擎著一面大紅旗，使勁地左右搖擺。後面是鑼鼓隊，……隊伍就按「將軍令」的節奏前進。後面跟著紅槍隊，……其裝扮都與抱爐的一個模樣。³³

上文為 1949 年 6 月解放軍部隊對靈溪戰役中大刀會的描述，持平而言，與其說大刀會是行進中的武裝部隊，不如說更像是地方神靈體系的遶境儀式。³⁴ 但為何這樣的隊伍會產生這樣大的戰力，曾多次與大刀會有接

30 陶大恭輯，〈大刀會組織及其淵源：大刀會〉，收入《大刀會始末》，附錄（一），頁 4。

31 同上註，頁 4-5。

32 見 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康豹關於民國時期湘西跳神與民變的討論，見 Paul Katz, “Dances of the Doomed-Ritual and Resistance among the Western Hunan Miao During Republican Era,” *Asia Major*, 30:2 (2017), 133-186.

33 《大刀會始末》，頁 73。

34 相關討論可見 Mark Meulenbeld, *Demonic Warfare: Daoism, Territorial Networks, and*

戰經驗的葉飛（1914-1999）認為大刀會實際上是一種「兇猛的密集衝刺」。³⁵另外，根據鄧倫修的記載，1944 年駐永嘉日軍也曾派員前往溫州外海的北關黨與大刀會有過接觸，還參觀朱超高大刀會的「開堂試刀」，日軍對大刀會眾展現出的戰力大為驚奇，還傳說贈送步槍數把給大刀會眾。³⁶不論如何，大刀會所能展現出的戰鬥能力是基於一般民眾對信仰中鬼神的畏懼與精神動員成功的密集衝刺戰法，並因此對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造成威脅。但何以宗旨為保存國學、修身養性的同善社，年輕恩職人員會離開故鄉前往溫州外海的小島，並選擇結合地方古老的大刀會武術傳統於 1944 年出陣對抗平陽縣政府，則與時任平陽縣長的張韶舞及第八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張寶琛的施政作為密切相關。

三、張韶舞與抗戰晚期的平陽地方政治

張韶舞（?-1951）為國民政府於 1939 年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簡稱 1939 年新縣制）後，賦予縣政府自治權與法人地位後任職最長的平陽縣長（1939-1946），³⁷他同時也是平陽縣史甚至民國時期任期最長的縣長。³⁸他的直屬長官為浙江第八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張寶琛（?-1951，任期 1940-1946）與浙江省主席黃紹竑（1895-1966）。不過，與遠在浙西永康的省主席相比，駐地永嘉的張寶琛更直接影響張韶舞的施政作為。³⁹張韶舞任滿後，編有一本施政成果報告書：《平陽六年》，

the History of a Ming Nove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35 葉飛，《故鄉征戰紀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頁 38-39。

36 《大刀會始末》，頁 22-23。

37 1928 年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縣長須知》一書，詳訂縣長的職權，見國民政府內政部編，《縣長須知》（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1928）。

38 根據王奇生的研究，民國後期全國縣長任期一年以下占 57.3%，1-2 年為 26.2%，3-4 年為 3.8%，4-5 年為 0.8%，超過六年為 1.5%。見王奇生，〈縣長：基層地方官的轉型〉，收入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364。

39 該制度起源於 1932 年南昌行營所轄的軍事區域。1936 年三月普行於全國各省。1933 年 4 月，浙江全省改劃為六個特區，1934 至 1946 年溫州為第八行政督察區，督察

洋洋灑灑四百多頁的篇幅讓學者得以一窺抗戰時平陽縣政。⁴⁰張寶琛對張韶舞有評價如下：

平陽人口七十三萬，能背誦國民公約與黨員守則者占大多數，無論男女老幼對長官立正鞠躬的敬禮姿勢，都做得相當正確，此為全省任何一縣之所不及。鄉鎮公所內部物質設備，相當充實。保民大會上能經常召集。徵兵成績為本區六縣之冠……。⁴¹

自 1940 年 2 月就任後，張寶琛就一直對張韶舞的精神動員能力深表贊許，也難怪他會在《平陽六年》的序言中評論張韶舞云：「其一貫方針，在求國家政令之徹底執行，而不使稍有抑損。」此外，1942 年 5 月，前來溫州進行省縣政檢閱團⁴²的省主席黃紹竑更是訝異於：「參與省主席歡迎會的列場民眾達三萬人以上，均能背誦黨員守則及國民公約，這絕不是臨時準備所能倖致的，至於集體歌詠之整齊嘹亮，在各縣亦屬罕見」。⁴³上文不難見到 1934 年以來國民政府全力推動「新生活運動」公民教育運動，經張韶舞施政對百姓造成的影響。⁴⁴不過，這樣強力措施所造成的民

區設行政專員為最高行政長官。兩度擔任浙江省主席的黃紹竑則點出此制度出現的兩個問題，黃基本認為此制有疊床架屋之嫌。見黃紹竑，《五十回憶：黃紹竑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432-433。

40 《平陽六年》為張韶舞所編出版於 1946 年，原書現藏於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檔案館，複本可見於溫州市圖書館地方古籍部，全書近 400 頁。內容為：序言、平陽縣政之特點、民政、財政、教育、經濟建設、地政、社會、計政、軍法、徵募、徵屬優待、保安、編練、警政、衛生、訓練、糧政、人事、各方業務。

41 〈張專員勉勵平陽鄉鎮長文〉，收入張韶舞編，《平陽六年》，長官訓話，未刊本。

42 「縣政檢閱」乃是黃紹竑主政浙江時制度發明，為省主席率團下鄉前往各縣進行縣政檢查並與官員與士紳進行座談，前後進行了四次全省縣政檢閱。但由於檢閱點過多，平均一縣只有檢閱兩天，到最後流於形式。見黃紹竑，《五十回憶：黃紹竑回憶錄》，頁 449-451。

43 見黃紹竑，〈民國三十一年五月黃主席在省會擴大紀念週報告〉，原文載自《東南日報》，收入張韶舞編，《平陽六年》，長官訓話，未刊本。

44 對於 1930 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精神動員的影響，可見沈松橋，〈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 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新史學》20.1(2009.3): 1-59。又可見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0(1998.6): 163-203。

怨，也可對照下文來自民間的看法：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到平陽視察。張韶舞強迫集合全縣壯丁、學生三萬餘人，站在北門塘河兩邊，大張旗鼓地歡迎省主席。數萬群眾，從上午站到下午，……。那天又恰好又敵機空襲，警報一響，人們東奔西跑，好多人被擠到河裡，……。還有一條擾民措施，便是強制人民背國民公約，似乎只要背上國民公約便不會做漢奸似的。……。⁴⁵

民間對張韶舞的指控自然有其情緒性與誇大的部分。不過，張執政時期的爭議也可從 1951 年 3 月 11 日與 5 月 1 日，中共平陽縣與溫州市政府分別召集兩萬人與三萬人的群眾集會公審張韶舞與張寶琛，隨即槍決兩位前任地方最高長官可見一斑。⁴⁶ 透過上述事例更重要的觀察點是：我們可以清楚發現當時民族國家的政府力量加上戰爭所引起的壓力，已經強力地透過教育規訓的方式瀰漫於民間的日常生活經驗中。但引起最大民怨的是張縣府以及抗戰晚期以來國民政府所推動的強硬徵兵政策。⁴⁷

國民政府於 1936 年開始推行徵兵制度，平陽縣也在同一個時間開

-
- 45 見王光銘、孔慶杭，〈黃梅時節家家苦，青草池塘處處冤：記張韶舞治平罪行〉，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選輯》第 3 輯，頁 67-68。
- 46 筆者認為召開公審大會，除了二張施政引起的爭議外，還有當時的政治氛圍與私人恩怨的因素。1942 年 2 月底至 5 月止，二張多次發動對中共山區勢力的圍剿，據稱有匪徒一百五十名遭到擊斃。被逮捕的中共黨員，部分被張關押在縣城內的紅龍殿內。1942 年 7 月 11 日，日軍再次登陸溫州。張逃離縣府前，下令處決關押在紅龍殿內的中共黨員，因此與日後中共浙南勢力結下血海深仇。張韶舞卸任後前往蘭州投靠安徽巢縣同鄉張治中將軍。1949 年 11 月，進入中共幹部培養學校：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準備接任新職的張韶舞在北京街頭被鄭海嘯之子鄭一平發現（其妹鄭明德為張韶舞所處決），張因此被補。見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浙南歷史大事記：1919 年 5 月 -1949 年 10 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浙南革命歷史文獻彙編：一、二戰時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被捕後的狀況，可見游壽澄，〈緝拿張韶舞歸案記〉，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頁 45-48。兩人的公審大會紀錄，可見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浙江省溫州歷史大事記：1949 年 5 月 -1994 年 12 月》，頁 17-18。
- 47 抗戰時期四川地區拉壯丁，可見於笹川裕史、奧村哲著，林敏等譯，《抗戰時期中國的後方社會：戰時總動員與農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特別是第二部分的討論。

始推行。⁴⁸ 徵兵制度在各地引起的爭議自不待言，張的前任徐用（1887-1955，任期 1937-1939）⁴⁹ 對徵兵採取相對消極的辦法，因此他在 1939 年 10 月離任時，尚積欠中央兵額九百餘名。這也見於黃紹竑的說法：

抗戰開始，兵員的補充自然有大量的需要。廿七年（1938）中央配賦本省的兵額數字相當龐大。……民國廿八年（1939）以後，配額雖繼續增加，而徵撥的數字，卻是每年都超過了的。直到民國卅一年（1942）敵人大舉竄擾浙東，淪陷區擴大後，徵兵的工作，才遭遇新的難關。⁵⁰

對照上文的看法可見，徵兵政策直到 1939 年後，方才符合上級政府的要求，也可以說中央政府因為戰事孔急，因此加強對省縣政府徵兵數的要求。但從當時文件中所讀到的急切，亦可推敲出徵兵推行的不易。⁵¹ 不過，屬於非淪陷區的平陽縣於張韶舞到任後，1940 年便超撥壯丁 151 名、1941-1942 年超撥 84 名並獲得省府嘉獎、1943 年更一舉超撥 627 名，因此記縣長大功一次。1944 年因平陽縣境內大刀會眾起事，因此欠撥兵員 170 名。不過，根據張縣府的說法，與當時溫州各縣相比，平陽縣欠額仍是最少，因此縣長的年終考績仍為甲等。1945 年全省奉令緊急徵兵，甚至舉辦「徵兵比賽」，方才驚人地超徵 4792 名。⁵² 對此誠如 1942 年永樂師管區司令所稱：「平陽辦兵役是硬幹的。」⁵³ 張縣府在幾天內就可以徵集到近八百名壯丁入營，也隱約可見國民政府始終為人詬病的「強拉壯丁」政策。除了下鄉強拉壯丁，張縣府徵兵的手法就是厲行「壯丁

48 國民政府徵兵制度的討論，見侯坤宏，〈抗戰時期的徵兵〉，《國史館館刊》10(1991.6): 147-172。

49 關於徐用，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縉雲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縉雲文史資料》第 6 輯（近現代人物）（麗水：編者印行，1994），頁 27-30。孔慶杭，〈民國時期一個開明縣長——徐用〉，收入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第 12 輯（溫州：編者印行，1994），頁 45-48。

50 黃紹竑，《五十回憶：黃紹竑回憶錄》，頁 398-399。

51 抗戰時期浙江的徵兵制度，可見楊振編著，《現行兵役要覽》（出版地不詳：浙江省戰時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1940）。

52 張韶舞編，《平陽六年》，工作報告：徵募，頁 152。

53 〈永樂師管區司令在平陽縣行政會議訓詞〉，由邱銘九主任代為宣讀，見張韶舞編，《平陽六年》，長官訓示，頁 16-27。

管制」政策。據平陽縣政府於 1940 年 10 月 1 日開始實行壯丁盤查哨設置辦法：

- 一、為實施壯丁管制，根絕逃役，特定本辦法。
- 二、盤查哨需擇定縣區或鄉鎮間交通要道設置之。
- 三、每哨設哨長一人（以所在地之保長兼任），哨兵四人，以各鄉鎮經組訓之國民兵派充，就近如有駐紮軍營，由駐紮軍營負責設置。
- 四、盤查哨之任務如左：
 - 甲、凡經過哨所之役齡壯丁（年滿十八歲至屆滿四十五歲），均須施以檢查。
 - 乙、檢查時務須詳細盤詰搜點，有無攜帶違警物品，及逃避兵役情事，但不得故意留難或需索，違者依法嚴懲。
 - 丙、凡壯丁已准予免役者，須檢驗本府核發之免役核准通知書後，方得放行。凡現役壯丁須攜帶中籤壯丁移往許可證，或人民出外通行證，如無證件得禁止其通過。⁵⁴

簡言之，壯丁管制就是設立關卡管制役齡壯丁人身自由，從而把平陽縣境進行軍事管理。進行管制的基礎是 1934 年開始建立的保甲制度，兩兩相加讓國家機器在地方社會中的力量更加清晰可辨。張縣府對逃避兵役者施以嚴厲處罰，處罰對象為以下三種：壯丁本人逃亡無蹤或避不應徵者、賣頂兵役者、舉家遷逃者以及非經徵兵手續逃充各機關各部隊兵員者。由此倒也可看出當時民眾是如何應對國家的強硬徵兵政策。為此，除了國民政府制訂的「妨礙兵役」罪的罰則，張縣府為達成超額的任務，祭出高額罰金的制度，除了對逃兵家屬進行人質扣押並課處一萬元以下，一千元以上罰款。役男家擁有的動產與不動產總值若不足兩萬元者，罰款為全部財產總值的十分之五，若是財產在兩萬以上者，則一律處以一萬元之處罰。逃兵的壯丁，如家中有同胞兄弟體格符合徵兵標準者則可以先抵充兵額與罰款。⁵⁵除了運用重罰對中產以上之家有非常大的約束力，張在任期間每年都召開兵役會議，縣境內所屬區鄉鎮保長都必須出

54 張韶舞編，《平陽六年》，工作報告：徵募，頁 154。

55 同上註。

席，與會人數也從 1940 年的 1325 人成長到 1945 年的 2565 人。這足以說明為何 1945 年度下令緊急辦理的徵兵比賽，平陽縣可以大幅勝出，張本人還因此得到行政院甲種二等光華獎章。從行政原理討論，張用連坐處罰的方式貫徹各保長必須負責的徵兵額；此外，過往常見保長運用職權進行「緩徵」，這時也因為張縣府嚴厲執行身家調查，使 1943 年度核准緩徵的壯丁減少一萬三千多名，從而釀成 1944 年的大刀會民變。⁵⁶

何以平陽與其他國統區各地壯丁皆視入伍抗敵為畏途？如王奇生指出：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以及兵役制度的不良，是導致戰時國軍戰鬥力下降的首要原因。⁵⁷ 在這樣的狀況下，加上長期陷入泥淖的戰局，使徵兵制度難以有效執行。為此，蔣介石指派紅十字會長蔣夢麟（1886-1954）對兵役制度進行實地研究，發現戰場上死亡與存活的壯丁比例高達 11：1。蔣介石看完蔣夢麟的報告，在對所屬軍官演講提到：

……覺得無面目做人，覺得對不起我們的民眾。據報告人親眼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邊，……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⁵⁸

再將討論焦點回到平陽縣境內，張韶舞也指出完成徵集程序的壯丁卻面臨沒有部隊前來接收，而必須依靠縣府長期給養的窘境。另一方面，上級政府發下每一名壯丁的徵集費用也僅有六元，根本不足壯丁一日三餐之用。在這樣的狀況下，就算有前述對抗逃避兵役的嚴刑峻法，但執行上卻不容易，張氏在工作報告中也承認逃役的風氣並無法有效地被遏止。除了制度上的官僚說詞，地方保長其實根本無法監管逃役者的財產，遑論執行高額的罰款；而第一線執行人員也難以對遺下的老弱婦孺過度施

56 同上註，頁 164-165。

57 王奇生，〈湖南會戰：戰時國軍的作戰能力〉，收入氏著，《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312-313。

58 見蔣介石，〈知恥圖強：蔣委員長出席黃山整軍預備會議演講文〉，引自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至九月）》（臺北：國史館，1994），頁 151-152。蔣夢麟的兵役報告，見蔣夢麟，《西潮·新潮》（長沙：岳麓書社，2000），頁 294-300。

加壓力。張韶舞與張寶琛最重要的推託是：本縣海岸線長達七十公里，管制困難。⁵⁹ 透過上文描述，我們不難理解何以正值役齡的壯丁，如同善社神職人員的董仁漲與朱超高等人，會選擇逃往溫州外海的小島。從很大程度來說，他們正是選擇逃離現代國家，甚至之後選擇對抗國家徵兵暴力的人群。

四、浙南大刀會民變與錢庫慘案

1945 年 4 月間，平陽縣南部礮山城門鄉關頭保長潘長流，因為不願意服從鄉長朱純齋要求攤派的一百八十員「救國捐」，因此與躲避兵役跟稅捐的壯丁一起到外海的頂草嶼（今蒼南縣頂草嶼島）開荒。當時在更外海的北龍島與南麂島教授大刀會法的蔡月祥，前來勸告潘長流等人應組成大刀會，否則對付不了國民黨。⁶⁰ 後來當地大刀會的人群逐漸發展到數百人之多，許多重要的鄉鎮也都發展出大刀會法壇。

（大刀會眾）開始時，與當地政府耍軟的一手，遇區、鄉來抓兵，則相率到北關島避一避；若是來收捐的，則賣窮叫苦，多說好聽話，或以五元、十元來支應應付。待到羽毛豐厚了，則強硬起來，各自為政。⁶¹

結合上文可發現，1945 年抗戰結束前，大刀會已經變成一般百姓與現代國家進行博奕對抗的重要人群組織，或是說面臨來自現代國家逐漸加重的政治壓力，地方社會運用他們熟悉的組織形式，從而在地方上與代表現代國家的代理人形成競爭態勢。

1943 年夏秋之間，閩東各縣先後爆發聲稱由各地同善社領導的大刀會起事。民變平息後，閩、浙兩省地方官員開始對所轄的同善社組織進行清查。⁶² 當時平陽縣同善社最重要的活動據點位於縣府所在的宜山

59 張韶舞編，《平陽六年》，工作報告：徵募，頁 170。

60 《大刀會始末》，頁 37。

61 同上註，頁 38。

62 關於 1943 年閩東大刀會運動，見申仲銘編著，《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民國國會門武裝》頁 68-69，181。

區，亦可見該組織與當地軍政人員的密切關係，不然也不用由宜山區長倪鴻章親自查辦。鄰近錢庫鎮的地方菁英也感知政府對此一地方大眾團體的政策風向轉變；另有一說則稱，因有地方菁英對董仁漲索賄不成，便向督察專員張寶琛告發同善社在錢庫地區「聚黨結會、意圖擾亂綏靖建國」。不論如何，同屬役男壯丁的董為躲避政府的查緝以及兵役，逃離錢庫到外海的南麂島躲藏。⁶³1944年初，董仁漲與島上其他大約200名壯丁，前往瑞安北龍島請來蔡月祥傳授同善社眾大刀會法術。當時溫州外海原本有盤據各島的「海匪」、依附日軍的烏軍，⁶⁴以及新加入的大刀會眾等三股呈現競合關係的武裝力量。由於困居海上的缺糧問題，董仁漲等人一直積極考慮要「打回老家」獲取維生與軍事資源。1944年3月8日，在與北龍島的大刀會眾以及南麂島上的烏軍進行整併後，董與三百多位壯丁自北嶺村（今蒼南縣巴曹鎮北嶺村）登陸，直取肥槽鎮的平陽縣護航大隊隊部。有意思的是，因護航大隊主力前一日下午移防到瑞安，隊部因而空虛，董氏的大刀會眾順利搶得步槍30枝與子彈數千發。隨後大刀會眾前往蘆浦鎮（今蒼南縣蘆浦鎮，董仁漲故鄉錢庫鄰鎮），焚毀之前查報董仁漲同善社活動的蘆浦鄉長楊志章私宅，然後會眾進駐望里鎮的北宋古寺護法寺。⁶⁵

63 南麂島位於平陽縣鰲江口外三十海浬處，現為浙江省重要的海洋風景區與海空軍基地，52個島嶼中最大的為南麂島（7.62平方公里），島上的地形多為丘陵，也有淡水提供。清光緒年間，南麂島歸屬平陽。平陽人王理孚（1876-1950）於1912年以「南麂漁佃公司」集資兩萬元，招募漁民開墾南麂。1942年與1945年，日軍兩度佔領南麂島。期間烏軍與大刀會眾也佔領過該島。王理孚為劉紹寬最重要的學生，可見王理孚著，張禹、陳盛獎編註，《王理孚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64 烏軍乃是當地人對臺灣人蔡功與日人成立「福建崙山維持會」的俗稱。1942年，日軍委任蔡為「閩浙邊區和平救國軍」司令，協助日軍控制台州以南的海域，他們的財政來源為向經過的漁船與商船抽稅，並協助日人維護航道安全。烏軍建立的方式，就是日軍授權願意跟他們合作維持治安勢力進行「建軍」。關於日人建軍政策的說明，見吳濁流著，鍾肇政譯，《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108-110。至於烏軍的來歷，可見福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鼎縣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3），頁621、640-641。

65 《大刀會始末》，頁4-5。護法寺為蒼南地區的重要佛教聖地，內有北宋建造的護法寺塔。

1994 年 3 月 10 日，張韶舞向保安司令張寶琛調兵前往護法寺進行圍剿失利，帶隊的縣自衛大隊隊長葉士元甚至因此戰死，大刀會眾虜獲槍枝數十挺。後續接連幾回合軍事勝利讓大刀會方軍心大振，以「不當兵、不完糧、不納稅」為組織號召的恩職董仁漲，成功結合大刀會武裝去對抗現代國家地方政權，也讓更多平陽各地的青壯年掀起延請法師開壇練法準備對抗張縣府的風潮。面對如此遍地開花的現象，3 月 15 日，張縣府的增援部隊與大刀會眾在項橋（今蒼南縣錢庫鎮項東村）爆發另一場遭遇戰，大刀會眾又再次占了上風。3 月 19 日大刀會眾更一度衝入金鄉鎮破壞國民黨地方保衛力量的包圍部屬。3 月 26 日與 27 日，多路大刀會眾兩度進攻縣府所在地宜山，造成浙保四團戰死官兵達五十名，張韶舞出逃鯨江鎮躲避。對於 3 月 27 日的縣城保衛戰，接戰狀況官方說法如下：

刀匪約二千餘人，分七路圍攻……。自 12 點大戰開始，匪一股數十人，已衝入宜山街尾，經我迫擊砲與重機槍阻擊後，該匪不支……。戰至下午五時，匪傷亡甚多，……我即施行追擊，當場擊斃計三四百人……。⁶⁶

綜合上文可見，原本因為逃避兵役而避居海島的三百壯丁經大刀會的精神武裝後，在不到一個月內多次擊潰國民黨地方保安力量，導致當地軍政官員顏面無光，甚至和平陽各地掀起運用大刀會組織對抗政府的風潮。面對來自民間的強力挑戰，慣於「諱敗揚功」⁶⁷ 國民黨地方部隊先是以重武器回擊群眾造成重大傷亡，再行報復性的「清鄉」釀成所謂的錢庫慘

66 張韶舞編，《平陽六年》，工作報告：保安，頁 185。

67 浙南地區在抗戰時期維持相對靜止的狀況。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先是於 1941 年 4 月 19 日攻入永嘉（當時的溫州府城），5 月 4 日撤走，國民黨方面稱四一九之變。7 月 11 日又攻入永嘉，同年 8 月 15 日撤走。1944 年 9 月 9 日再次攻入永嘉，1945 年 6 月 18 日撤走。之後，日軍在永嘉維持少量駐軍。1945 年 5 月 27 日，日軍往南攻入平陽縣城，張韶舞出逃鯨江，同年 6 月 10 日撤走。見黃紹竑，《五十回憶：黃紹竑回憶錄》，頁 380-381。之後，每一次日軍的掃蕩部隊撤走後，逃離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回到駐地都會自稱是「光復」，因此會出現溫州兩次光復的奇特說法。相關抗戰時間溫州地方軍政官員「諱敗揚功」的記載，見羅士傑，〈城隍神與近代溫州地方政治：以 1949 年黃式蘇當城隍為討論中心〉，收入康豹、高萬桑主編，《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頁 132-134。

案。

錢庫慘案基本上是 1944 年 3 月底宜山包圍戰後，國民黨地方保安部隊發動的清鄉活動。3 月 29 日，國民黨增援軍對董仁漲故鄉錢庫鎮進行報復性「清鄉」，許多資料來源指出此舉造成的無辜傷亡甚多。為此，當時廣州中山大學的溫州籍王季思教授，在親國民黨部的東南日報撰有一樂府詩諷刺當時政府的施政失敗：

江南紛傳大刀會，砲打不死槍可避。窮民無知惑者多，捻香歃血相肩募。
黃梅雨、平陽苦，萬家切齒張韶舞。
星星之火欲燎原，官兵四合集風雨。官兵合，過錢庫，入民家，搜賊貨。
老幼殺盡雞犬躲，少婦無褲死道左，明日烏軍來救火。⁶⁸

事實上，王季思詩中所指的烏軍就是董仁漲等人組成的登陸大刀會眾，不過董等人在圍攻宜山失敗後即退回海上，自然不可能回防故鄉錢庫。報復心切的國民黨軍對錢庫發動「清鄉」，據稱有 236 位平民遭到殺害，傷 106 人，燒毀民房 1,296 棟，洗劫 1,184 戶，錢庫古鎮付之一炬。⁶⁹ 1944 年 5 月 25 日，平陽縣士紳在平陽日報聯名刊登〈平陽縣宜山區匪災善後委員會募捐啓事〉，談到錢庫慘案對地方社會造成的衝擊：「各鄉鎮被毀民房數千間，洗劫二千餘戶，死傷數千人，被災民眾何以萬計」。⁷⁰ 也因為如此，浙江政壇掀起檢討風波。1944 年 4 月 18 日，親近省府的《浙江日報》發表社論針對稍早的大刀會事件評論道：「聞此次所剿者，多為大刀會匪，參加大刀會，以農民、漁民、蟻民為多。」無異於質疑溫州平陽的雙張首長對此事件提出的「匪亂」解釋。該文也對張韶舞「剿撫政策」重新檢視，並提出「剿不如撫」的建議。文中也明白點出張韶舞為達成徵兵徵糧指標所累積的民怨，實為此次大刀會民變的爆發主因。最後，立場親近省府的浙江日報也對張韶舞等人的鎮壓政策提出異議，

68 1944 年錢庫慘案的記載見張立福編著，《龍港話古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2004），頁 76-78。

69 《大刀會始末》，附錄，頁 13。當時浙江日報的隨軍記者，認為 1944 年大刀會起事，是清同治年間金錢會事件的翻版，見佚名，〈蕩平平陽大刀會匪〉，原文藏於浙江省檔案館，收入《大刀會始末》，附錄，頁 16。

70 《平陽日報》，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原文藏於平陽縣檔案館。

並點出：「不可專為推諉責任打算，均諉之謂禍起倉促，事絕無因，民即是匪，格殺勿論，此固得計，無如天下人之耳目何？」⁷¹ 由此可見，錢庫慘案已經引起政府內部對張寶琛與張韶舞兩人施政能力的質疑，從而影響雙張一百八十度地改變對同善社與大刀會的政策。如後文所見，之後張縣府對董仁漲等人改採收撫的政策。⁷²

錢庫慘案之後，透過民間既有的同善社與大刀會等結社組織反抗抽壯丁的地方人群並未因此噤聲。1944 年 3 月底，另一位大刀會運動的重要領導人朱超高，也因為國民黨對同善社組織的查緝壓力，循董仁漲模式，於該年秋天避走至福鼎縣外海的大嶠山島，之後輾轉到北關島。1945 年一月，隨著戰局變化，浙江省加重對所屬各縣市徵兵的要求，甚至出現「徵兵比賽」造成地方更大的壓力。面對這樣的劫難，橋墩鎮的同善社恩職江運金、朱宗稿、許日斜等人建議不願意入伍的壯丁可前往北關島投靠朱超高。該年春節前後，島上聚集大約有數百位來自橋墩一帶的逃役壯丁，這群同善社眾除了用大刀會法術持續進行精神武裝與衝鋒訓練，他們也透過向經過漁商船抽稅的辦法籌措生存財源。⁷³ 另一方面，懍於去年錢庫慘案後來自省垣的輿論壓力與之前大刀會組織所展現出的戰力，雙張於 1945 年 1 月底就開始與董、朱等人的大刀會進行接觸，並進行收編談判。經過多次縣府內部的會議與雙方談判，達成的收編協議共有十五條，其中最重要的條款應該就是：「收編後在伍官兵不論何藉均援照兵役法，以入營服役論」以及政府承諾不再追究 1943 與 1944 年兩次大刀會運動起事的法律責任，並保障參加會眾的財產與人身安全，並禁止報復。⁷⁴ 經過幾個月談判，原訂該年 5 月 31 日，董朱兩人率眾上岸接受政府的點編，但由於他們聲稱會眾內部仍有不同的意見，因此延後原訂的點編程序。同時，日軍於 6 月 3 至 4 日攻入縣府宜山，反

71 《浙江日報》，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72 王奇生的研究也指出，國民政府對縣長的考績制度十分繁雜且嚴厲，並因此造成縣長施政困難的現象，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頁 384-385。

73 《大刀會始末》，頁 20。

74 《大刀會始末》，頁 28。

而是董仁漲與朱超高部於此時完成點編，共編成兩個大隊 551 名隊員，董、朱兩人之後成為編制內平陽縣外海護航大隊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張縣府為此收編案，一共耗去縣府 400 餘萬的鉅額經費。不過，從更廣闊的脈絡觀察，這一筆收編經費等於是張縣府施政引發爭議的後續帳單。⁷⁵

除了董、朱兩陣營，吸收逃役壯丁並以大刀會法術精神動員的祖師爺其實是蔡月祥。董、朱兩人接受收編後，蔡選擇與不服從的部眾在馬站區外海的北關島繼續發展。張韶舞之後結合福鼎縣武裝保安力量也無法有效壓制蔡月祥的大刀會組織，遂使後續反悔收編的壯丁回到海上投靠「蔡師父」。幾經擴張，蔡陣營的力量又從北關島發展回陸上。1945 年 9 月中旬，馬站區長王瑄給張韶舞的報告指出：大刀會眾已形成包圍之勢，估計人數從四百一路直升到三千。⁷⁶ 這或許有料敵從寬的考慮，且時當抗戰結束，張韶舞等人雖一再對第三戰區指揮部強調大刀會造成的威脅，卻一直未有援軍前來。經過大約十天的對峙，1945 年 9 月 24 日，蔡月祥陣營衝破國民黨的封鎖線，一路從近海的蒼南往山區的泰順縣與瑞安的珊溪鎮（今屬溫州市文成縣）挺進，中間爆發好幾場小規模戰鬥。進入給養相對困難的山區後，因為原來就沒有嚴密的組織與訓練，蔡的會眾陸續出現脫隊離開的現象。10 月 7 日，蔡的重要支持者潘長流選擇率領 205 人前往馬站區署要求辦理自新，並上繳步槍 51 支，刀矛 65 把，以及法衣 61 件。到了 10 月 27 日，蔡月祥的會眾組織已經消散不見。⁷⁷ 蔡雖然後來又重新回到海上，之後並在南麂島住下。1946 年 3 月平陽縣府得知蔡躲在南麂，之後派兵前往搜捕不果。蔡後來在杭州一間佛寺躲藏，之後潛回溫州探親被捕下獄。經過審訊，蔡於 1948 年 3 月被處決，得年 31 歲。⁷⁸ 至於先前接受國民政府收編的董仁漲，政府同意他與他的

75 雙張如此不惜鉅資收編董朱兩人，應與來自上級政府究責有關。見《大刀會始末》，頁 27-32。當時刀匪宣撫費用支出狀況，見張韶舞編，《平陽六年》，工作報告，財政，頁 41-43。

76 《大刀會始末》，頁 42-43。

77 《大刀會始末》，頁 45-48。

78 《大刀會始末》，頁 65-66。

徒眾回到錢庫繼續修佛經商。朱超高則先是被張寶琛下令監禁，釋放後轉往上海短暫經商。董、朱兩人的境遇，亦足見他們與現代國家的關係，並非單純的零和對抗關係，更接近雙方考量到彼此的政治實力，決定如何合作的問題。1947 年全面爆發的國共內戰與之後的冷戰，對董朱兩人以及他們支持群眾的衝擊，以及這一群人營生方式的改變，則已經是後話，將留待另文展開討論處理。⁷⁹

五、結 語

除了本文開頭點出挑戰中共新政權的平陽大刀會民變外，抗戰時期因對政府施政不滿爆發的民變，也可見於國統區的四川、湖南，以及日本控制區乃至於中共革命根據地，而且多有民間結社發揮人群組織作用與不同的現代國家力量對峙的狀況。⁸⁰ 當時的執政者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發展？可舉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對錢庫事件的評論：

……浙江的平陽縣對於徵兵徵糧及推行各種政令，成績都算是最優等的，因為如此，無知的老百姓，就被人利用，在短時間聚集好多人，以抗兵抗糧為口號，而實行軌外的暴動。⁸¹

79 董仁漲於 1945 年 10 月決定接受國民政府的收編方案，並回到錢庫老家居住繼續修佛經商。但顯然董在錢庫地區仍有重要人群影響力，所以 1949 年 5 月，中共江南區委進駐宜山，準備積極對付董仁漲及其追隨者。中共在溫州建立新政權後，董又入海到洞頭縣與國民黨軍隊殘部合作，成為東南沿海重要反共勢力。1949 年 10 月 8 日洞頭解放，董隨之被捕。根據中共資料指稱：董在入獄後，仍在獄中開展同善社活動，他在 1950 年 5 月遭到槍決。至於朱超高在上海經商失敗回到溫州，後來轉往福建平潭島發展反共勢力。

80 這樣的現象不只發生在浙江，抗戰時期四川的地方結社如袍哥與哥老會，也在反抗政府施政的民變中扮演重要角色。見笹川裕史、奧村哲著，林敏等譯，《抗戰時期中國的後方社會：戰時總動員與農村》，頁 52-53。又可見 Di Wang, "A College Student's Rural Journey: Earl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Seen through Fieldwork on Sichuan's Secret Socie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12.1 (2017.4): 1-31.

81 黃紹竑，《五十回憶：黃紹竑回憶錄》，頁 424。

黃的說法其實非常典型，就是用「有心人煽動無知百姓」迴避政府施政不當甚至造成重大傷害的問題，⁸²並強調或醜化所謂「野心家」在民變中扮演的關鍵角色。⁸³這樣的論述一方面高估現代國家政權暴力執行的正當性，一方面則低估地方社會中固有秩序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發生在抗戰晚期的大刀會民變又涉及戰後被共產黨政府嚴格打擊的同善社，更容易陷入諱莫如深的狀況。如本文所致力還原的，1944年起至1950年方才平息的平陽大刀會民變，是地方人群運用日常生活中流傳已久的同善社與大刀會組織傳統，想去解決當時面臨重要生計威脅的歷史發展過程。

此外，董仁漲、朱超高與蔡月祥三人，透過不為民族國家推崇的現代性價值觀所喜，卻在地方社會日常生活經驗中發揮組織作用的同善社與大刀會，與現代國家競爭。藉由對1940年代平陽大刀會運動領導人背景與所處時空環境的分析，可以清楚發現：當時選擇與政府對抗的同善社與大刀會眾顯然不是強調與現代國家力量結合去推動「革命」與「政權建設」的擁護者，而是對「舊學」或說對民族國家推動的現代化工程迄今的成果抱持懷疑態度的地方人群。⁸⁴再從更大的發展脈絡分析，國民政府與張韶舞縣府於抗戰晚期所推動的強力徵兵政策過程，體現廿世紀以來民族國家透過政權建設將統治權在地方社會「明晰化」的歷史發展。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長期存在平陽地方的社區宗教傳統（包括寺廟體系以及教派傳統），到二十世紀中期如何被當地百姓用來組織自己與現

82 如美國史家 Keith Schoppa（蕭邦齊）其有關抗戰時期中國難民的研究，即針對國民政府施政與抗敵戰略重新檢視。書中提到當時國民政府為了阻滯日軍前進，大量地摧毀城市中的能源、交通等維生設備，並大舉破壞道路，雖然發揮的阻滯效果有限，卻明顯造成百姓生活巨大傷害。見 Keith Schoppa,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對於更進一步的統計資料，可見張根福，《抗戰時期浙江省人口遷移與社會影響》（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83 類似的看法可見於鄭燦，《中國邪教禍源考》（臺北：中國孔學會，1979），頁37。

84 19世紀末以來，地方文人生活與思想的轉型與面對的諸多挑戰與自我調適，可見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代國家政權推行的政策相互競爭與抗衡。從史家後見之明出發，這一系列面對現代國家「必敗」武裝衝突背後真正的核心問題，很大程度與「自主性」有關。⁸⁵ 雖然平陽百姓看似依照求生本能進行政治選擇，但從生活方式的選擇角度觀察，他們其實更接近傳統意義中對抗來自國家單向權力，以捍衛選擇自主性的普通百姓。不過，伴隨現代國家的進化與政權更迭，地方社會同時面對傳統「自主性」快速流失的問題。⁸⁶

對自主性的要求與掙扎的產生，涉及當時政治的良窳狀況。此間也並不只是牽涉到中國在進入二十世紀後於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卷化」問題而已，⁸⁷ 現代國家官僚體系強調執行的效率，使得國家權力得以快速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經驗。如學者指出，在災難性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前，中國百姓對高執行力的政府抱有高期望的現象。⁸⁸ 國民政府受限當時內外執行能力下降等因素，國家對民間的滲透顯然遭遇許多困難，並造成當時社會嚴重的矛盾與對立，從而出現現代國家與「地下社會」對立競爭的政治局面。抗戰結束初期擔任浙江省第一行政區專員吳壽彭⁸⁹ 發出「我國境內有兩個國家」之嘆：

85 見 James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98. 中譯本見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曉毅譯，《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 371。類似的看法，也可見 James Scott, *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 Dig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xxi.

86 Benedict Anderson 關於民族國家成長過程對人民生活影響的討論，見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87 見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8 見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馮客 (Frank Dikötter)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歷史的討論，見馮客著，郭文襄等譯，《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2)。馮客著，向淑容、堯嘉寧譯，《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 1962-1976》(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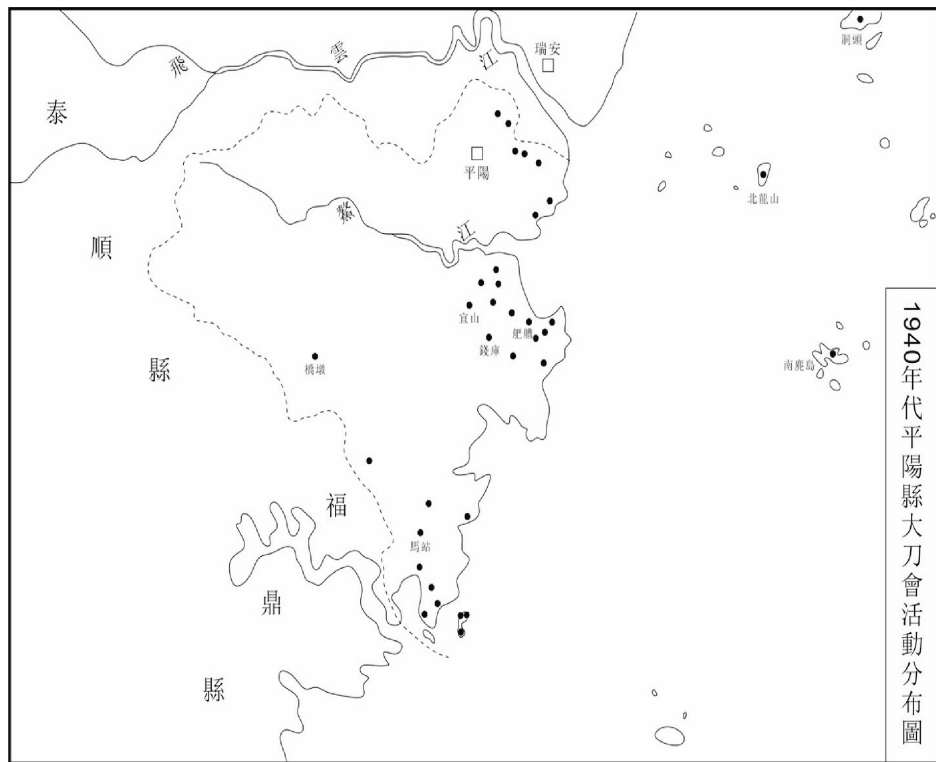
89 吳壽彭為江蘇無錫人，上海交大畢業，曾是「復興社」的重要幹部。1933 年開始在

這兩個國家有不同的言語，行不同的法令，用不同的幣制，奉不同的領袖，從不同的宗教，過不同的生活。……我們所說的另外一個國，只是沒有旗子，他除了掛我們的旗子之外，其他的典章文物是都具備了的。……這一個國家的機關、印信與公事文書，只是用來矇混、或遮眼的。這一個國家的生活，不是生產與消費，是徵派與享用。……這國的宗教信條，是物質重於生命，為著搜集一袋穀子，不惜殺死三個百姓。⁹⁰

即使官位貴如吳壽彭也會感嘆當時政府施政與實際狀況產生的巨大落差，並點出當時地方出現兩套政治權力體系平行運作並彼此抗衡牽制的政治現實。引人反思的是，執政當局中仍有相當部分認為上文提及「兩個社會」的對立，不能透過互補方式，而是必須透過以啓蒙與現代性為名，由上而下「取代」地方社會中運行已久的民間邏輯與組織秩序。面對這樣落差，雖說民間對兩個國家都有應對方法，但國家機器除了以效率之名，在資源上與地方其他勢力競爭，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得道德制高點，說服地方民眾與執政當局合作，從而真正地取代那群同善社眾所推動與維繫的民間道德秩序，仍需要更多區域性的實證研究。此外，如何從地方社會角度重新理解懷抱現代性的民族國家與擁抱傳統道德觀的宗教團體，如何在 1949 年以後的各地華人社會中持續其競合關係，也會是後續學者繼續努力的方向。

南昌行營任職，1937 年任浙西行署政務處處長，1938 年任浙江省政工室副主任，1945 年 3 月 9 日任浙江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6 年調任第十區同樣職位。關於此人的背景，可見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 1037。

90 此文為吳壽彭的〈冷暑秋思〉，對抗戰晚期到結束初期浙江地方政治有深刻描寫。黃邵竑特別在回憶錄中抄錄此文。見黃紹竑，《五十回憶：黃紹竑回憶錄》，頁 535-536。



1940年代平陽縣大刀會活動分布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平陽日報》，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平陽縣檔案館藏。

《同善總社傳單彙編，丁巳至癸亥，附通啟》，未刊本。

《東南日報》。平陽縣檔案館藏。

《浙江日報》，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浙江省溫州歷史大事記：1949年5月-1994年12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

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浙南歷史大事記：1919年5月-1949年10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 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浙南革命歷史文獻彙編：一、二戰時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蒼南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第7輯（大刀會始末），溫州：編者印行，1992。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縉雲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縉雲文史資料》第6輯（近現代人物），麗水：編者印行，1994。
- 王理孚著，張禹、陳盛獎編註，《王理孚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 平陽縣志編纂委員會，《平陽縣志》，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3。
- 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第10、12輯，溫州：編者印行，1992、1994。
- 平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平陽文史資料選輯》，平陽：編者印行，1985。
- 申仲銘編著，《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民國會門武裝》，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台灣連翹：台灣的歷史見證》，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
- 國民政府內政部編，《縣長須知》，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1928。
- 張桐著，《杜隱園日記》。
- 張韶舞編，《平陽六年》，未刊本。
- 陳鎮波編，〈劉厚莊年譜〉，收入蒼南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蒼南文史資料》第16輯（劉紹寬專輯），溫州：編者印行，2001。
- 陶成章，《浙案紀略》，收入湯志鈞編，《陶成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黃紹竑，《五十回憶：黃紹竑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 溫州市志編纂委員會編，《溫州市志》，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楊振編著，《現行兵役要覽》，出版地不詳：浙江省戰時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1940。
- 葉飛，《故鄉征戰紀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
- 福鼎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鼎縣志》，福州：海風出版社，2003。
-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 劉紹寬著，《厚莊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7。
- 蔣夢麟，《西潮·新潮》，長沙：岳麓書社，2000。
- 鄭海嘯口述，葉啟友主編，《鄭海嘯回憶錄》，平陽：中共平陽縣委黨史研究室，1991。

瞿詔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至九月）》，臺北：國史館，1994。

二、近人論著

- (日) 三谷孝著，李恩民等譯 2002 《秘密結社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日) 小武海櫻子 2009 〈同善社與慈善事業：以合川會善堂慈善會為例〉，收入《民間儒教與救世團體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頁 365-384。
- 王見川 1995 〈同善社早期歷史（1912-1945）初探〉，收入王見川主編，《民間宗教·民國時期的教門專輯》第 1 輯，臺北：南天書局，頁 57-82。
- 王見川 2011 〈同善社早期的特點及在雲南的發展：兼談其與「鸞壇」、「儒教」的關係〉，《民俗曲藝》172(2011.6): 127-159。
- 王見川、康豹、宗樹人 2011 〈導言：救世團體研究的回顧〉，《民俗曲藝》172(2011.6): 13-20。
- 王奇生 2010 《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日) 末光高義 1932 《支那の秘密結社と慈善結社》，大連：滿州評論社。
- 沈松橋 2009 〈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 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新史學》20.1(2009.3): 1-59。
- 周建超 2002 《秘密社會與中國民主革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邵 雍 1997 《中國會道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侯坤宏 1991 〈抗戰時期的徵兵〉，《國史館館刊》10(1991.6): 147-172。
- 范純武 2015 〈八德：近代中國救世團體的道德類目與實踐〉，收入康豹、高萬桑編，《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225-259。
- 孫 江 2016 《作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宗教》，臺北：博揚文化出版公司。
-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張立福編著 2004 《龍港話古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
- 張根福 2001 《抗戰時期浙江省人口遷移與社會影響》，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日) 笹川裕史、奧村哲著，林敏等譯 2013 《抗戰時期中國的後方社會：戰時總動員與農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陳瑞贊 2008 〈溫州市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敘錄〉，《文獻》2008.4(2008.10): 150-159。
- 陸仲偉 2002 《中國秘密社會：第五卷·民國會道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馮客 (Frank Dikötter) 著，向淑容、堯嘉寧譯 2017 《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 1962-1976》，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馮客 (Frank Dikötter) 著，郭文襄等譯 2012 《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
- 黃金麟 1998 〈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0(1998.6): 163-203。
- 鄭 燦 1979 《中國邪教禍源考》，臺北：中國孔學會。
- 羅士傑 〈城隍神與近代溫州地方政治：以 1949 年黃式蘇當城隍為討論中心〉，收入康豹、高萬桑主編，《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頁 101-140。
- 張根福、岳欽韜著 2009 《抗戰時期浙江省社會變遷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馬西沙、韓秉方 1992 《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林孝庭 2015 《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8 - 198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Brown, Jeremy, and Paul Pickowicz, eds. 2010.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uara, Prasenjit.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ara, Prasenjit. 2003.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 DuBois, Thomas David. 2005. *The Sacred Village: 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Esherick, Joseph.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ossaert, Vincent, and David A. Palmer. 2011.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ar, Barend ter. 1998.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Leiden: Brill.
- Harrison, Henrietta. 2005.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tz, Paul. 2017. "Dances of the Doomed-Ritual and Resistance among the Western Hunan Miao During Republican Era." *Asia Major*, 30:2(133-186).
- Meulenbeld, Mark. 2015. *Demonic Warfare: Daoism, Territorial Networks, and the History of a Ming Nove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Owby, David. 2016. "Redemptive Socie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Vincent Goossaert, Jan Kiely and John Lagerwey eds.,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1915*. Leiden: Brill.vol.2, pp. 685-750.
- Schoppa, Keith. 2011.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見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曉毅譯，《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16。
- Scott, James. 2012. *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 Dig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ng, Di. 2017. "A College Student's Rural Journey: Earl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Seen through Fieldwork on Sichuan's Secret Socie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12.1(2017.4): 1-31.

The Dadaohui and Tongshanshe: A Case Study of Popular Uprising and Local Society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Lo Shih-chi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popular uprising organized by the Tongshanshe (同善社 Fellowship of Goodness) and the Dadaohui (大刀會 Big Sword Association) in Pingyang County 平陽縣, Zhejiang Province that lasted from 1942 to 1950. According to 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s, the Tongshanshe and Dadaohui were state-outlawed evil cults that had flourished in local society since the late Qing; however, after examining government archives and related local documen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ongshanshe was in fact an important redemptive society, while the Dadaohui had been a popular association of martial artists based in Pingyang since the late Qing. In order to avoid conscription and heavy taxation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wo Tongshanshe priests and their followers fled across the sea to escape. They later decid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Dadaohui to train their members to fight with the Nationalist troops. The uprising began in 1943 and upset the Nationalist forces several times in 1944. But by the end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after a series of negotiations. By re-examining this popular uprising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ar, we are able to not only shed light on the realities of loc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but also re-evaluate the local importance of popular associations and redemptive societies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CCP regime in the 1950s.

Keywords: Tongshanshe, Dadaohui, redemptive societies, popular associations, Chinese local politics

* Lo Shin-chi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